

“左”“右”之间：北伐前后 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

冯筱才

内容提要 北伐前后，中共在上海曾与虞洽卿等商人有过密切联系，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即在此背景下展开。在此过程中，虞洽卿曾被视为“资产阶级左派”代表人物，也是工人暴动后在上海建立“临时市政府”的重要合作者。不过，虞与中共的合作主要仍在国民党的框架中进行，当与之有旧谊的蒋介石到上海后，虞便成为蒋重要的财政顾问。尽管虞洽卿的行动，未必能代表上海商界多数商人的倾向，但却反映了某些商人潜在的政治投机心理及对政商关系的刻意经营。由于时势与环境的影响，中共在当时的实际政治斗争中也会弹性运用“阶级分析”，来解释其运用虞洽卿等人的政策。但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失败，却为党内反对派提供了批判依据，甚至影响到后来路线政策的走向。

关键词 虞洽卿 革命 政商关系 意识形态

一、前言

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商人的角色一直是暧昧不明的。对缺乏金钱的革命者来说，商人往往成为他们汲取经费的目标。对处于弱勢的革命者而言，商人也有可能成为其拓展势力的依靠力量。同时，政治变动，也会给商人带来牟利的机会。革命在某些商人眼里未尝不是一种生意，所谓“投机革命”，有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批判语汇，其实也反映了不少商人的实际行为动机。对革命者与商人之间种种基于实际利益权衡基础上的关系互动，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近代中国革命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塑造史，1920年代之后，由于列宁主义政党的兴起，阶级分析被引入，不同层次的民众开始被归入不同的“阶级”。大小商人，则都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处于“阶级金字塔”顶端的“大资产阶级”，很长时间内都是党派宣传家谴责的对象。不过，这类判断是随着时势变化而不断修正的。尤其在五卅运动发生之后，一些中共领袖曾经对“大资产阶级”有重新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戴上“左派”的帽子。其中，虞洽卿便是最著名的一位。在1927年后的中共历史叙述中，虞氏是“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主要支持者，也是给蒋提供经济援助的

所谓“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故一直被视为“买办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①然而,不大为人注意的是,在“四·一二政变”前,虞洽卿曾经是中共眼中最左倾的大资产阶级领袖,也是中共最重要的政治合作伙伴之一。无论是五卅运动,还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中共在其中的作为都与虞洽卿的合作紧密相关。那么,一贯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虞洽卿,为何要介入此类“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段合作历史,对中共又有何影响?

国外学界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目前仍以柯博文(Parks M. Coble)与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ere)的著作为主流看法。讨论到北伐前后上海商人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新政权的关系,无论是柯博文的“冲突论”,还是白吉尔的“扶持论”,其实都是把商人作为整体性的阶级加以考察,忽略了其内部的利益分歧与个体表现。白吉尔认为商人在这场变动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为了保持秩序,力量衰弱的他们需要寻求强权保护。北伐前后像虞洽卿一类商人主动介入政治,乃至与中共合作的历史,她却完全没有注意到。柯博文则过分强调1927年5月后上海商人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蒋的种种极端的压榨行动。尽管他也提到过上海“资本家”因对中共煽动的工潮不安而支持蒋,但此前商人与蒋的关系,作者几乎没有着墨,至于“资本家”与中共的合作,更不在他视野之中。^②国内类似题目的研究,也存在这方面的不足,多数论者总喜欢把一些个人的行为,概括成所谓“阶级”行动,因此有意无意忽略了许多互相矛盾的史实。^③就笔者所知,只有中共党史学者对虞洽卿等上海商人在北伐前后与中共合作的历史稍有提及。当然,在较早的党史脉络的叙述中,与虞洽卿的合作被当作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证据。^④最近几年,由于部分前苏联档案中译本的出版,也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上海三次工人暴动中共产国际的角色,以及中共领导人运用资产阶级的政策。^⑤不过对于虞洽卿等人行动的解释仍逃不出“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叙述框架。

在此前的研究中,笔者对近代商人与政治的关系已有一些讨论,但侧重于分析商人是如何被动卷入政治的。^⑥然而,如前所述,北伐前后一些上海商人确实在主动参与政治变局,甚至成为某些事件的主要人物,本文所讨论的1926—1927年虞洽卿等人与中共及国民党的合作,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应该对此作何解释?本文的研究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并进而说明近代中国政商关系的某些特点,同时也希望通过虞洽卿北伐前后政治动向的分析,加深对1920年代革命运动史的理解。

① 参见华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春耕书局1931年版);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Marie Claire Bergere, Trans. Janet Lloyd,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35—241; Parks M. Coble,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8—46.

③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29页;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03页;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6—161页。

④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7页;胡庆云《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何时在全党占统治地位》,《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⑤ 徐刚《共产国际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党史党建》2001年第9期;金立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新考》,《上海党史党建》2002年第3期。

⑥ 笔者曾经认为近代中国的商人阶层尚未能构成一个阶级,大多数商人的政治介入行为旨在保护其个体产权或市面秩序;同时,笔者的研究也显示,北伐前后,商人常常被革命浪潮所席卷,甚至以矛克矛,成为当时“商民运动”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参见拙著《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及《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二、“左派资产阶级领袖”与上海第一次工人暴动

中共早期的活动多以上海为基地,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非常关注当地“资产阶级”的动态,希望能够利用这些既存势力,推动工作的进行。1923年的反直系运动中,中共就曾经对上海商人的政治力量寄予希望。^①五卅运动期间,中共在与上海总商会的合作中获益良多,对商人的力量有了更深认识。当时的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是中共最重要的合作者。不过这种关系,在五卅运动末期显然出现了问题。1925年9月,中共主持的上海总工会被奉系将领邢士廉封闭,虞洽卿即被视为背后的唆使者。然而,到1926年下半年,中共与虞洽卿的关系又开始升温。第一次上海工人暴动,就是在这种密切合作关系下发生的。

(一) 五卅运动后中共对虞洽卿的态度变化

五卅运动期间,中共与虞洽卿的合作主要是通过上海总工会进行的。中共在此过程中势力得以壮大,而虞洽卿也通过控制罢工捐款对总工会发挥影响,然而两者之间很早就出现矛盾。1925年9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在有关总工会封闭事件的宣传大纲中就指出,“上海的大资产阶级如虞洽卿等亦梦想笼络工人,握在自己掌中”,要“换一批人出来办”一个“大资产阶级”的工会。^②此处所讲确有其事。在虞洽卿支持下,潘冬林等人曾利用“爱国募金”创建工人俭德会,在纱厂工人中大量发展会员。^③中共认为该会能够获得“群众信仰”,故视其为工运最大威胁。在海员方面,据说虞洽卿也以其熟友李征五出面组织工会,与中共控制的海员工会抗衡。^④上海总工会报告也指称虞洽卿破坏工人团结,把持救济费,并与潘冬林设法攻击上海总工会的名誉。^⑤1926年5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通过的“上海区职工运动决议案”,遂决定要“积极的驱除在工人群众中的资本家的势力”,并特别提到虞洽卿与潘冬林这两位“恶首”,尤其对于俭德会,更誓言要“于最短时间内消灭之”。^⑥可见,至少从工运的角度来看,两者关系已恶化至极。

虞洽卿之所以在五卅运动中与上海总工会合作,除了当时的政局因素之外,他无疑也在趁机抬升个人地位,如以此为背景,加紧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交涉增添华董一案。为避免祸端再生,公共租界纳税外人会最终在1926年3月议决增设3名华董。中共认为这是帝国主义“以软和诱惑的手段”,使大资产阶级离开民众战线,减少民众革命的力量。^⑦但是,对当时力量弱小的中共来说,如果要在上海进行“民众革命”,他们仍必须与有实力的商人建立关系。五卅运动一周年之际,为

^① 冯筱才《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第72—73页。在此前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萨法罗夫给俄共中央局的报告中,就已经援引张国焘等人提供的情报,对上海商人的政治力量表示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页。

^② 《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1页。

^③ 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有关工人俭德会,可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7、845—846页;《工人俭德会之简章》,《钱业月报》第5卷第10号,1925年10月15日,“杂纂”,第7—8页。潘曾担任上海商总联合会交际主任。参见唐豪等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78页。据严谔声回忆,潘冬林原是专烧西菜的红帮厨师,曾为文监师路商联合会代表,后由虞洽卿介绍他到日商内外棉纱厂包饭,因此与虞拉上关系,为虞奔走。严谔声《我与商界联合会》,《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2期。

^④ 王永玺《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69—71页。

^⑤ 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⑥ 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140—141页。

^⑦ 《五卅运动》第1辑,第189—190页。

了能够借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上海区委曾以学生组织的名义与一些背后“有相当势力及群众”的名流绅商接洽。这些人便包括在五卅运动中表现积极的虞洽卿、唐少川及郭任远、曾琦等人。^①其中,虞洽卿显然被认为拥有商界动员的实力。但这些接洽并没有取得实质成绩,报告称以上诸人均“含糊敷衍”^②。5月19日,虞率中国实业考察团赴日,游历近一月始返沪。中共认为虞是在有意回避五卅纪念,对其非常不满。^③中共领袖瞿秋白等人也在党刊上撰文批驳虞洽卿在日本发表的所谓“对日亲善”论。^④

在虞返回上海后,上海总商会即围绕会长选举爆发斗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报告中把上海总商会成员分成三派:一派为旧交通系势力,以傅筱庵、方椒伯为首领;其次是政学系,以霍守华、冯少山为领袖;第三则是安福系势力,以虞洽卿为领袖。并认为此次选举是交通系和政学系之争,虞洽卿则为两方排斥,陷于孤立。^⑤此种分析当然有些道理,但仅从政治派系角度来理解又不太准确。^⑥不过商界互相倾轧确为中共寻求某派商界力量支持提供了机会。其计划似乎是赞助选举失败的霍守华一派,打倒傅筱庵派,建立总商会左派。^⑦为了发展与霍派的关系,中共派人与该派的沪商正谊社联系,试图建立合作渠道,表示愿帮助他们攻击总商会,希望他们能以具体办法援助工人。^⑧该社后来虽发表过一点声援性质的宣言,但并没有进一步的实质性援助行动。

由于不能得到实力人物的支持,中共在上海五卅运动周年之际发动的罢工及宣传运动均不太成功。^⑨报告显示,当时中共控制且能公开活动的三个机构(总工会、学生联合会与国民党市党部),让普通上海市民感到“头痛”,已经很难依靠它们来进行群众动员,促成“市民运动”。中共既然不能“将所有上海市民弄出来”,反抗“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唯有另觅他途。为了制造联合战线,上海区委曾提出发展商民运动的计划,目的是准备推翻原本被中共定义为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另造团体以替代之,但结果并不理想。^⑩为了实现“市民运动”的目标,中共开始重新考虑发展与虞洽卿的合作关系。

(二) 北伐开始后中共与虞洽卿合作之确立

中共与虞洽卿重建关系,也与当时形势变化有关。1925年10月,孙传芳发动驱奉战争,与虞氏关系不错的奉系被迫撤出上海及江苏,常之英等人被俘,最后由虞洽卿保释。^⑪虞与孙此前并无关系,他通常被外界视为安福一派,亲奉色彩又很明显,因此,当孙控制上海后,尽管虞仍与之虚与

① 唐少川似为旧国民党系首领,而郭任远(复旦大学副校长)与学界相关,曾琦代表的是“国家主义派”。

② 《五卅运动》第1辑,第192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35页。

③ 《五卅运动》第1辑,第189—190页。

④ 纯《虞洽卿之“中日亲善”论》,《中国青年》第123期,1926年6月13日;秋白《日本对华屠杀后的中日亲善论》,《向导》第159期,1926年6月23日。

⑤ 上海特别市党部商民部六月份工作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档案(以下简称“KMT”),五部档/11088。虞洽卿确实与安福系领袖段祺瑞有很好的关系,包括此前统治上海的卢永祥、何丰林等人,都算是皖系将领。

⑥ 霍守华与冯少山确实很想控制总商会,但虞洽卿则未必与傅筱庵完全对立。实际上,虞、傅同属宁波系,霍、冯则属于“新广东系”,地域斗争也相当明显。宁波系内部虽不尽一致,但在选举时却能联合对外。此次总商会选举本来就是在虞洽卿任内完成,当时就有人在选举后攻击上海总商会有变成“某府旅沪同乡会”之嫌。虞洽卿在选举后也欣然担任新一届会董,即表示承认傅筱庵此届商会。唐豪等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474—495页。

⑦ 上海特别市党部商民部六月份工作报告, KMT, 五部档/11088。

⑧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⑨ 关于五卅运动周年运动,可参见《五卅运动》第1辑,第143—178页。

⑩ 《五卅运动》第1辑,第178页,《北伐前后的商民运动(1924—1930)》,第92—93页。

⑪ 1925年1月,奉军张宗昌部曾入驻上海,以常之英为淞沪警察厅长,张曾是李征五的部属。李背景复杂,既属青帮大亨,又有军界脉络,同时也是旅沪宁波人之重要领袖,与虞洽卿来往密切,因此虞与张、常也保持较好关系。

委蛇, 但已不能安于其位了。

在五卅运动前夕, 虞曾被段祺瑞任命为淞沪商埠会办。尽管由于时局动荡, 所谓“淞沪自治市”并未实现, 但虞仍有成为未来“自治市”首脑人物的可能。然而, 孙传芳控制江浙一带后, 即视上海为最重要的饷源地。1926年5月4日, 孙传芳自任淞沪商埠督办, 委丁文江为督办公署总办。尽管虞洽卿也被任命为9名参议会参议之一, 但失去会办职位的他完全成为一个附属角色。正是在此一背景下, 8日, 当上海商界开会欢迎孙氏时, 虞代表上海商界团体致辞, 即强调“政府应代表多数人意愿, 政府不良, 可以推翻。将来取之于地方的租税一定要用之于地方。”^①丁文江上任后, 即欲在孙传芳的支持下, 完成一个新的“大上海建设计划”。^②为统一警察力量, 丁氏奉孙氏之命要解散据说内部复杂的商界保卫团, 该团原本在虞洽卿、王晓籁等人控制下, 因此两者利益冲突产生。

1926年7月9日,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全国形势为之大变。为了得到上海商人的支持, 此前, 广东国民政府曾邀请上海总商会派代表赴粤参观。对于此事, 上海商界意见并不一致, 但与蒋介石等人本有关系之虞洽卿表示支持。最后以王晓籁与盛冠中(虞洽卿的女婿)为主要代表赴粤访问, 一方面是观察广东政治经济, 另外一个目的据说是疏通上海到广州的货物运输。^③其背后, 虞洽卿这一派商人也有拉近与南方新兴势力关系的考虑。王与盛在访问期间表现甚为“革命”, 盛冠中在演说中甚至表示要农工商兵四个大炮一齐向帝国主义发射。^④23日晚, 蒋介石在广州宴请王晓籁等人。^⑤不清楚他们之间有何具体商谈与约定, 但王、盛等人对国共两党在南方的发展, 以及蒋介石等旧识的新变化有深切的体会。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他们回到上海后, 虞洽卿的政治态度有了很大变化。

也许是受“资产阶级论”影响过甚, 学者几乎都认为上海的大商人在“阶级利益”上与中共是矛盾的, 所以他们在北伐开始后都倾向于支持国民党与蒋介石。然而, 在蒋介石“分共”之前, 多数地方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是无法清楚区分开来的, 尤其在上海, 国民党党部更是在中共影响之下。尽管国共两党在内部有分歧, 但是在商人看来, 都属于与苏俄关系密切的一个新兴的政治阵营。在实际的政治策略中, 以北洋系为对手的在沪国共两党人士, 至少在1927年3月前, 仍然有着畅通的沟通合作渠道。像虞洽卿这一类商人, 他要加强与南方的关系, 自然要与其代表性机构接触, 这就包括中共控制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上海总工会、学生联合会。至少在蒋介石与鲍罗廷及中共关系恶化前, 这些机构的活动也是蒋关注并且支持的。

北伐开始后, 中共与虞洽卿的关系改善, 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1926年8月, 中共打算在沪西发动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但罢工进行得非常不顺利, 参加罢工的工人们需要救济费, 中共却拿不出钱。于是, 上海区委决定派人以工会的名义去找虞洽卿, 要他援助并且协助募捐。此时, 虞表现得积极, 他首先让潘冬林参与罢工调解, 并帮忙找律师处理受伤工人起诉的事宜。在潘调解进展不利时, 他还亲自出面。到9月初, 中共对与虞建立合作已有信心, 这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职工部主任汪寿华及组织部主任赵世炎等人。9月3日, 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会议上, 称要利用时机在上海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 除了发动工人学生之外, 对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抱有较大希望。此次会议遂决议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 表示要“从虞洽卿一直到工人都去联合”。

① 《昨日中法官商欢迎孙传芳》, 1926年5月9日《申报》, 第13版。

② 参见胡适《丁文江传》, 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第86—102页。

③ 中共珠海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苏兆征研究史料》,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263页。

④ 《上海商界代表慰问罢工纪》, 《工人之路特号》第393期, 1926年7月31日。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 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第623页。

对当时的小沙渡罢工,上海区委想将其弄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尽管国民政府为罢工曾有2万元拨款,但远远不敷运用,因此会议也决定要“尽力去与虞洽卿他们接洽,要他们以实力来维持”。^①

接下来的几天里,汪寿华频繁出入于虞洽卿住宅。由汪的报告可知,北伐军的进展对虞刺激很大,以至于虞一见汪就谈蒋介石部队进军武汉计划,并认为孙传芳并无实际力量。此种判断,可能与当时正在策划的夏超渐变有关。虞似乎是想联合奉军,支持浙军,响应北伐军,将孙传芳势力从上海、浙江驱逐出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虞洽卿表示全力支持工会的罢工计划,承诺一旦罢工,他愿意向各方面募捐,并称已得到黄金荣的配合承诺。虞的表态让中共受到极大的鼓励,双方合作的议题也迅速由援助罢工发展到建立政府。9月7日的上海区委会议便专门讨论联合虞洽卿的政策。然而,双方合作并无意识形态认同的前提,主要仍是力量的互相利用,其背景则是北伐军势力的上升与正在酝酿的浙江事变。^②其实,无论是虞洽卿,还是黄金荣,当时他们的合作对象,与其说是中共,还不如说是广州国民政府,当然中共也意识到他们的表态背后有这种色彩。

有意思的是,或者是为了缓解联合大商人政策与党义间的紧张,中共仍然把虞洽卿这一派商人的举动“意识形态化”。例如,罗亦农即表示“现在中国发生新现象,就是资产阶级的分化的表现,就是中国大商买办阶级确为反革命的,纯为帝国主义扶助,如傅筱庵等,此外土著的资产阶级应当是革命的,过去我们未看出。”^③而虞洽卿一方,也懂得在口头上把自己的行为“革命化”,如潘冬林便对江苏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表示“大家都是同志了”,对这种“近极意拉拢吾党”的行为,中共方面自然有很深印象。^④然而,虞派人士的表态,有多少是出于主义的认同,可能负责接洽的中共干部心里也没底。

(三) 第一次上海工人暴动中的虞洽卿

当时中共与虞洽卿这一派商人之所以酝酿建立政府,与江西战事及浙江事变分不开。1924年9月,孙传芳进占浙江,因其主要目标是卢永祥,所以对浙江地方军队曾使用笼络的办法。但是,当北伐军势力上升时,夏超等浙江地方派系便想联络南方,将孙氏势力驱赶出浙江,甚至希望与上海方面的力量结合,使浙沪联为一体。此时,北伐军正在江西与孙传芳五省联军鏖战,上海之政治工作也开始列入国民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海第一次工人暴动即是在此种形势下发生的。而虞洽卿等人之所以参与其事,与此背景密不可分。

为了推动浙江与上海之变动,1926年9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以侯绍裘、吴敬恒、何成浚、朱季恂、张人杰、叶楚傖、钮永建7人为委员。^⑤钮永建来沪后,全权代表国民政府与各方势力接洽,在上海设立办事机关。据说钮永建还通过联络青帮势力,组织起一支号称数千人的队伍。钮永建成为虞洽卿等人与南方势力及蒋介石沟通的主要渠道。^⑥但中共对虞与钮永建等人的联络表示不安,罗亦农即强调上海运动必须以虞为领袖,并要积极推动他行动。以虞为中心,其实暗含与钮永建及其背后的张静江等人争夺控制权的意味。中共不希望虞受钮之指挥,尽管中共在内部报告中称虞手上其实只有“流氓与保卫团”,但在当时,这些可能存在的武装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44—152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57页。

③ 《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④ 《1925—1926年朱季恂、邵季昂等致柳亚子函》,《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2期。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页。

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90—591页。

是起事的主要依靠。因此, 离间钮、虞关系便成为中共上海区委的重要工作。^① 不过, 后来中共也承认, 钮永建到上海后, 他们与虞洽卿能谈的主要是政治问题, 如成立“保卫和平委员会”, 而军事问题只能与钮接洽。^② 9月23日, 陈独秀在一封给上海区委的信中, 要求他们在孙传芳可能失败之际, 加紧对江浙、安徽及虞洽卿方面开展活动, 尽力将虞洽卿、包世杰等人都拉入到“市民运动”中来。^③ 显然, 虞洽卿已开始被视为“市民领袖”了。

不过, 此时中共虽然已在提防“国民党右派”, 但实际工作仍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以国民政府为重心。而虞洽卿则似乎与浙江夏超部及奉军都有联络, 中共担心虞与奉方关系过近, 或“使浙联奉”, 影响浙江方面与国民政府的合作。^④ 其实, 虞之所以会有所动作, 都以孙传芳势力的可能崩塌为前提。罗亦农在10月15日的会议上针对虞洽卿的心态, 曾表示“现在上海是个投机社会, 不仅虞洽卿, 他们一方面不甘受帝主压迫, 一方面无经验, 始终观望投机。”中共非常清楚, 像虞洽卿这类商人, 不看到孙传芳败局已定, 是不会“决定策略”的。^⑤

然而, 当时在中国的苏俄代表的分析却相当乐观且非常概念化。1926年10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拉菲斯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 即认为孙传芳建立的军阀“联邦”已经开始四分五裂, “更先进”的广州势力明显获得了“亲日的大资产阶级”的青睐, 他们与“共产党人的社会力量”建立了“十分完备的组织”, 等待着前线的彻底失败。这封信还特别提到“领导反孙传芳势力的是一位明显亲日派人士”, 这无疑是指虞洽卿。信中也非常明白地说明, 在上海起事中资产阶级要起带头作用, 是苏俄顾问参与制定的计划。共产国际代表希望这次暴动将在独立的中立旗帜下进行。之所以如此, 也许与当时的国际舆论有关, 苏俄当局可能不希望在北伐军势力尚未控制全局的时候, 就与其他外国列强在上海直接发生冲突。^⑥ 共产国际另外一位重要代表维经斯基在暴动前一天的信, 也证明了这一计划与苏俄的关系。维氏在信中指出: 反孙的斗争正在上海广泛展开, 12个月前采取的在争取商人和城市民生派自治的旗帜下将孙逐出上海的方针,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称不排除在最近几天内成立由商人和国民党人组成的、主张正式或非正式承认国民政府的政权委员会。^⑦

对虞洽卿等人来说, 上海暴动的前提是孙传芳势力趋于瓦解。然而, 到10月中旬, 蒋介石的军队在江西战场进展受阻, 九江、南昌久攻不下。15日, 夏超在杭州宣布脱离孙传芳, 并将其保安队开向嘉兴, 似有进逼上海之态势。起初, 虞尚有所表现。16日, 虞洽卿会见汪寿华时, 表示愿意出来组织和平维持会, 希望钮永建能够先行制造破坏工作。但虞不愿承担军事方面的工作, 更不愿公开发表呼吁书。^⑧ 次日, 虞洽卿与汪寿华等人在其住宅召开了一个“工商代表临时会”, 商议以“上海市民和平维持会”名义组织政府。中共声明不会在此机构占主要地位, 只要“暗中指导”, 这让虞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 第173—174页。虞洽卿曾对汪寿华宣称, 他手上有3000人, 武器由原五省联军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提供。

②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第590—591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 第165页。包是冯玉祥在上海的代表。

④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 第174—175页。

⑤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9页。

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第574—577页。

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第588页。所谓“12个月前”, 是否暗示1925年底苏共就制订了此一计划, 此一细节尚待考证。

⑧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8号记录》(1926年10月28日),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第590—591页。

比较满意。同时,虞洽卿还召集各商业行帮开会,商议组织上海市政委员会,似有趁机登台之想法。但是,夏超之举事因得不到浙军其他派系的支持,即于18日自动退兵。在这种情形下,虞洽卿及王晓籁等人又开始持观望态度。^①

可是中共仍然希望在钮永建的配合下冒险发动暴动。10月23日晚,在双方合作下,闸北与南市200多名“工人”分路冒险进攻警察局,同时钮也出动帮会武装百余人。但行动很快失败,队伍随即被打散或逃光,中共中央军委技术书记奚佐尧则被逮捕枪杀。^②在行动前夕,陈独秀与罗亦农等人专门就组织保安委员会一事与虞洽卿谈判,但遭到虞的拒绝。^③虞不想为这种莽撞的举动承担巨大的风险。^④

事后,虞洽卿等人责怪总工会过于冒进,在其他同盟者都不准备配合的情形下,单独行动。^⑤中共则在事后的报告中,指责虞洽卿等资产阶级分子“无力量,太投机”,称以其为暴动的中心及主体过于幼稚。^⑥其实,这种检讨没有意义,因为中共上海区委在暴动前对“资产阶级动摇性”已有清楚认识。^⑦在力量弱小的情形下,中共只有联合这些可能帮助自己的力量来壮大自己。因此,中共在总结报告中仍然肯定暴动中“商人派”(即“进步的资产阶级如虞洽卿、王晓籁等”)的作用。^⑧这种矛盾的分析其实始终存在于中共与虞洽卿等上海商人的合作过程之中,且与苏俄对华政策中的实用主义因素有关。

1926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检讨第一次暴动的失败原因。罗亦农即表示,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确,在政变中起政治领导作用的应该是这里聚集在“日本人”^⑨周围的民族资产阶级。无疑这样做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不过罗也承认,所谓“资产阶级的军事力量”是一个骗局。陈独秀与罗亦农都表示以后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不能把他们看作是“先锋队”。但陈同时也表示,“发动政变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大资产阶级那里”,只是钮永建到上海后,事情变成了纯粹的军事政变。维经斯基也赞同这个看法,认为钮的到来,让“资产阶级退到一边去了”,使中共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彭述之则认为,虞洽卿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流氓无产阶级,他强调虽然不能指望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但也不能低估它的作用。他认为经过一段时期,资产阶级会变得比较有觉悟。^⑩在现实与环境左右下,中共仍然只能继续保持与虞洽卿等人的合作关系。

①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2—27页。

② 下动员令时据说总工会有二三百人,钮永建有数百人〔《中共上海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记录——上海暴动的善后工作及继续问题》(1926年10月24日),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34页〕,但最后工人真正出动的可能只有80余人,而且身份也许不是工人。《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6年10月26日),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55、59页。《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91页。

③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97页。

④ 罗亦农在报告中曾提到潘冬林的话:商人不是工人,如果积极参加,财产会被没收的。这种心理比较能够反映虞的实际想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97页。

⑤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90—591页。

⑥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36、40、54页。

⑦ 上海区委曾在一份文件中直接指出,“资产阶级一时左倾,总是带投机的性质(即做生意的性质),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他们利用我们的帮助以取得他们的政治地位,我们亦利用他们的号召以发展我们的势力。”周尚文、贺世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⑧ 《上海区委关于上海第一次武装暴动的总结报告》(1926年11月24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上海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36—37页。

⑨ 此处所谓“日本人”是虞洽卿的代号。

⑩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90—591页。

三、从二次暴动到三次暴动 “民众领袖”的变化

第一次暴动的失败,似乎让中共“更好地了解了上海的资产阶级”^①。苏俄代表与中共对商人的政治投机性也有了更多认识,但为了能够配合北伐军的战事,同时也为了掌握上海的政治局势,他们仍然需要与虞洽卿等人合作。其中,中共在上海的实际力量不强是一个原因,而制造“市民运动”的烟幕,以及与国民党展开政治竞争等,也都是影响因素。

(一) 上海自治运动与“民众领袖”的提出

1926年11月初,北伐军在江西战场进展取得重要突破。4日,北伐军攻占九江;7日,孙传芳的军队撤出南昌,孙随即在南京宣布五省戒严。江浙内部也在自治运动的旗帜下,开始波动不安。14日,蔡元培、褚辅成等人在上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宣称三省应为民治区域,一切军政民政由人民推举委员处理,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并由人民推举代表向广州及奉鲁方面运动和平。^②三省联合会表面采取“中立”姿态,实际则是配合北伐军行动,其主要人物无一不是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者。该会成立次日,蒋介石也发布通电促各省人民自决,“驱逐残余军阀”,组织各省省政府与国民会议预备会。其运用“人民自治”来从内部打击敌人之政治作用明显。

由于北伐军在江西战场折损过大,中共方面认为北伐军不可能迅速东下。同时,孙传芳军事势力也大受打击,对上海的控制便相应减弱。因此,中共认为暴动时机又趋成熟。11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决定要以主动地位来“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③。不过,政府的组织形式仍趋向“大资产阶级”与各大团体推举代表成立委员会,由钮永建出来号召,政权则交给虞洽卿。^④当然,促成资产阶级的政权对中共而言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彭述之即明白表示,“这个政府也许不能长久,但我们也须做一下”。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到浓厚的过渡性策略意味。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陈独秀说“我们现在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建军事的,虞洽卿民众领袖。”^⑤后来此语曾经成为批判陈氏“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证据。但当时陈是在一种特殊的语境中作此表达的。因为从11月上旬的形势看,如果中共要再次迅速发动暴动,就必须依靠钮永建与一些军队首领接洽,如严春阳、李宝章以及海军等方面。这些线索都在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议及江苏特务委员会负责人的钮永建手中。同时,陈独秀等人也不希望看到起事后成立一个军人控制的政府,这样的话,中共的地位就无法保证。所以,他们希望以虞洽卿为主角组织一个“自治政府”,但其运作能够完全为中共所控制,进而拓展势力。其实,这与后来苏俄顾问提出的“江浙政权左派化”策略显然是一脉相承的。^⑥

在当时的形势下,上海的政治情形也越来越复杂,各方面都有人在活动,被中共注意到的便包括“资产阶级的虞洽卿派,有民校左派的钮永建派,有政客褚辅成派,还有全苏公会、研究系等”。杨宇霆、张学良也派人来活动。在此情形下,中共认为只有实现一个“民众的暴动”,建立一个“市民自治政

①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92页。

② 《省党部致三省联合会函》、《三省人士联合之昨闻,改三省为民治区域》,1926年11月13日《申报》,第14版《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正式成立》,1926年11月15日《申报》,第9版。

③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九江攻下后的上海暴动问题》(1926年11月6日),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70页。

④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68页。

⑤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特别会议记录——对上海运动目前的策略、区委内部组织分工》(1926年11月6日),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78—79页。

⑥ 有关此点,可以参见坂野良吉《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与中国共产党》,《工运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府的组织”才能抑制各方。^①在这些有实力的派系中,中共当时认为能够运动的,大概就是“资产阶级的虞洽卿派”因此,利用虞派商人,共同推进以组织政府为目标的自治运动,便成为中共工作的主要方向。^②然而,中共“市民自治的把戏”^③的内在动机,是想以此控制上海,进而制衡国民党尤其是权势正在上升的蒋介石。这种目的越到后来越明朗,至1927年2月中旬,中共内部已就反蒋达成共识,拉住虞洽卿等所谓的左派资产阶级,与拉住国民党内的其他“左派”势力一样重要。^④

此时陈独秀等中共领袖特别重视虞洽卿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虞洽卿所代表的上海“大资产阶级”与英美在华势力有密切联系。因此,以虞洽卿的旗号在上海起事,建立一个形式上的“商人政府”,不仅可以减弱外人的恐惧心理,甚至有可能得到其谅解与支持。^⑤虞洽卿等人实际上成为中共用来遮掩政府本质的烟雾弹。中共亦希望此“左派”政府在北伐军抵沪后能继续存在,以“避免帝国主义直接干涉的危险”。^⑥此时,由于担心北伐军武力收回租界,英国与日本、法国等均开始向上海派兵,英军更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武装游行,故中共对外人干涉的忧虑并不是无的放矢。

同时,从现实情形看,中共也希望通过“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增加各国驻沪领事承认新政权的可能,阻止山东张宗昌的军队南下。如果张宗昌的军队占领上海,中共的计划无疑会大受影响。所以,成立以商人为主的市政府,尤其又以张氏旧识虞洽卿为市政府首领,中共认为也可以避免张宗昌借“反赤”为名而出兵。^⑦不过,中共对虞洽卿联奉的担心,却始终贯穿于双方合作的过程中。中共担忧,即使没有“反赤”借口,若孙传芳放弃上海,奉系张宗昌仍会南下,到时候接近张宗昌的虞洽卿未必会表示抵制,反而有可能联张以获得上海的控制权。而且,即便虞洽卿能以“自治运动”的名义,反对张宗昌到上海,但如果张控制了南京,“以虞为事实领袖之上海资产阶级市政府”也必然会为其提供财政支持。^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上海区委认为就应该对虞洽卿“严重监视”,强制其服从中共指挥。中共对虞洽卿的运用,主要的策略是割断虞与其他势力之间的联络,以免对自身的计划造成威胁。不过,这种计划却充满了单方面空想的色彩,对虞而言,分散的政治投机,显然比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强得多。

(二) 中共二次暴动的发动与虞洽卿等人的态度

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等人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利用商人的困难,尤其要在不利环境中再次发动暴动,商人往往会望而却步。如曾被认为很激进的沪商正谊社及代表“中小商人”的上海商总联合会,也不愿意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担心此种举动会危害到个人与财产。^⑨其实,中共以联合虞洽卿等人为工作重心,也与商界动员不力有关。然而,虞亦是观风行事之人。11月12日,罗亦农在一次会议上就说虞洽卿和王晓籛等人已成了“杯酒妇人的英雄派”,专门躺在妓院里吃酒,避免

① 《上海区委通告第86号 关于组织领导上海市民暴动问题以及具体工作方针》(1926年11月9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4页。民校即指国民党。

② 《上海区委通告 枢字第八十九号》(1926年11月24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46页。

③ 此语出自1926年11月6日的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特别会议上彭述之的谈话。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78页。

④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18页。

⑤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88页。

⑥ 《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4页。

⑦ 《上海区委秘书处通讯第八号》(1927年1月5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第630页;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08页。

⑧ 《上海区委关于上海第一次武装暴动的总结报告》(1926年11月24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41—42页。

⑨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83页。

各方面监视。然而 根本原因却在于国民党军事力量不充足,大家有恐惧心理。^① 为了游说虞氏,罗亦农也想到以孙传芳扣押其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一事为材料,尽量鼓动。^② 但此种办法基本属于空谈,饱经世故的虞氏如何会掉进简单的激将法圈套?

不过,在与中共干部联络时,喜欢夸口的虞仍给了他们不少希望。12月18日,上海区委有关自治运动的报告中,对虞洽卿与中共合作前景很乐观,称“自治运动遂渐渐被资产阶级的领袖虞洽卿等所认识,而与我们为积极的联合活动”^③。维经斯基致莫斯科的信中,也大力推崇上海资产阶级的影响力,认为他们甚至能“迫使某一军事集团接受它的意志”,有可能找机会与在沪的军事力量结盟,以便在上海建立自治。^④ 这里所说,大概指当时虞洽卿与浙军周凤岐部接洽一事。12月13日,浙江省长陈仪联合其他浙军部队(包括周部)发动浙江自治,国共两党趁机活动,建立左派省政府。但运动旋即失败,孙传芳在江浙一带加紧镇压反对势力。在此环境下,上海的工作更难进行。1927年1月3日,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在沪宣布戒严,情势更趋紧张。无论是中共,还是钮永建,或虞洽卿,各方活动都暂时处于休寂状态。二次暴动似乎一时难以实现。

2月初,上海的形势始有改观,由于北伐东路军在浙江步步推进,至该月中旬已接近杭州,国共两党的活动再度活跃。2月19日,东路军进占杭州;同时,在钮永建与总工会共同策划下,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不过,总工会按照中共决议,强调此次罢工完全系政治性质,只对军阀,不对资本家。^⑤ 其用意无疑在加强与“资产阶级”的联络,以免招致商人反感。而上海区委也希望在罢工发生后,迅速促成商人总同盟罢市,以造成暴动局面。然而,尽管与王晓籁及商界领袖数次磋商,总罢市却未能实现。中共甚至试图通过恐吓,或“造谣言”,“动之以感情”等多种手段来促使商人罢市^⑥,但效果似乎都不彰。其原因应与当时李宝章在上海以恐怖杀戮的办法来震慑社会有关^⑦,虞洽卿等人对此可能也不表赞成。

罢工第二天,中共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市民众公开发布“为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市民书”,其中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共同政纲”,宣布要由上海市临时革命政府召集市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上海市民政府。其中特别强调“市内一切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皆绝对自由,非经市民代表大会的执行委员会之紧急法令,不受任何限度”,即早先所说“不要政权要自由”原则的具体化。^⑧ 22日,上海区委即在全市范围内散发传单,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并在《国民日报》刊登委员名单:汪寿华、罗亦农、钮惕生、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章郁庵、王承伟、刘荣简、周孝公、张曙时。^⑨ 此份名单的公布,等于将虞洽卿与党人合作的事实公诸于世,而此举事前也未征求虞的意见,颇有点逼其就范的味道。这让本欲伺机而动的虞非常不快,其

①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罗亦农、赵世炎报告东南军政形势、上海自治运动及暴动问题》,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87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84页。

③ 《上海区委关于上海自治运动中苏浙皖三省联合会情况的报告》(1926年12月18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987年2月,第98页。

④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年1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6—17页。

⑤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23页。

⑥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33页。

⑦ 2月22日,上海商界重要法团均致函李宝章,呼吁对参与罢工者宽容办理,勿以杀戮为办法,激动众愤。上海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商业公会档案 S173/1/60,第1—4页。

⑧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27—129页。

⑨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34页。

态度乃趋于消极,甚至表示要在报纸发告白,声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①,以免惹祸上身。

22日,上海罢工工人据称已达到30万之众^②,中共决定单方面发动暴动。先是海军“建威”、“建康”两炮舰受策动,在高昌庙向陆上开炮20余发,同时闸北工人举行暴动,抢警察署枪械。此种举动被钮永建及吴稚晖等人视为中共“抢功”之作,深表不满。^③暴动使钮永建、虞洽卿等人与中共的行动同盟面临危机。是日下午,中共宣布暴动紧急刹车,并请商界调和复工。^④不过,据说钮与虞等人仍然在给上海驻军与警察的劝告信中签字,要求驻沪军警采取合作态度。^⑤此外,因暴动中中共干部章郁庵、张维桢、廖陈云(即陈云)等人被捕,赵世炎乃请上海总工会出面,托虞洽卿帮忙让巡捕房放人。^⑥这一细节也说明中共在上海活动力量的限度。正因为此,就当时的现实状况而言,中共广泛联络有实力的商人,甚至帮会首领杜月笙,都是相当理性务实的办法。^⑦这种关系的存在也有助于中共在行动失败后不久,还能迅速积聚力量再一次发动暴动。

(三) 第三次暴动前后中共与虞洽卿的接洽

第二次上海暴动发生之际,蒋介石与鲍罗廷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武汉内部充满了反蒋的声音。然而在上海,由于中共力量过于弱小,如果要建立左派政权,自然仍需要与拥有实力的国民党及商人合作。因此,二次暴动流产后,中共即去找虞洽卿、钮永建等人作解释,以免影响双方合作关系。^⑧

在2月24日上海特委会议上,汪寿华转述了与虞洽卿、王晓籁见面的过程。虞、王对暴动行动似乎很惊讶,询问总工会的内幕究竟如何,并告诉汪,外面均认为罢工完全为中共包办。据此来看,虞洽卿对总工会的情形了解得还不是很透彻。不过,虞、王也表示,他们赞同罢工与复工。王晓籁更是声称“不怕革命”,自己虽是商人,但喜欢改革政治,即使“与C. P.一块来作事也不怕”。这种表示虽然不知道有几分真实性,但从后来的事实看,王晓籁应该早与蒋介石等人建立了直接联系,其与中共合作也已与张静江或蒋介石等人通气。^⑨与此同时,钮永建也与中共达成谅解。^⑩上海的合作仍在继续。

孙传芳失去浙江后,“五省联军”土崩瓦解,遂向奉系求助。2月23日,直鲁联军在张宗昌率领下开抵南京;24日,张属毕庶澄部进驻上海。中共一直隐忧的“奉军南下”成为事实,暴动前景更趋复杂。为了避免上海情形恶化,中共特委会决议请虞洽卿等人与毕部设法发生关系。^⑪共产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等人也要求中共迅速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吸引群众加入,并通过群众对资产

①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52页。

② 施英(赵世炎):《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记录》,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97—198页。

③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38页。

④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36页。

⑤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42页。

⑥ 中共杨浦区委组织部、中共杨浦区党史办公室、杨浦区档案局编《奋斗:中国沪东地区斗争史(1923.7—1937.7)》,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4页。

⑦ 有关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与青帮之关系,可参见衣明玉《上海三次武装起义与上海青帮》,《兰台世界》2006年第2期。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研究中注意到中共在发动第三次工人暴动时与帮会势力的合作,但她却没有讨论到中共与商人的合作,其对中共发动工人的能力也估计过高。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1页。

⑧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51—152页。吴稚晖为中共单方面发动二次暴动事曾大动肝火,致函陈独秀表示抗议。相关史事之考证可参见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⑨ 1935年时任上海市商会主席的王晓籁曾经在《商业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这段往事有所回顾,他没有提到共产党,但是并不避讳曾担任中共主导的市民大会主席与临时市政府委员。《王晓籁自述》,《档案与史学》1988年第4期,第33页。

⑩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52页。

⑪ 《特委会会议记录》(1927年2月25日),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78页。

阶级施加压力,“拖着”他们跑。^①然而,洞悉地方实情的陈独秀等人对此建议却不以为然,仍然以钮、虞为工作的中心,双方商议的主要内容也仍在于政权安排与暴动步骤。

在成立政府问题上,虞洽卿倾向于采取议会制办法,赞成中共由团体代表组成“市民代表会议”的主张,并希望应该让更多商人参加,而中共则要求用苏维埃制度。虞显然对此等“赤化”名词相当敏感,罗亦农等人慎重考虑。然而,相对国民党吴稚晖等人提出的“以党治国”^②,中共还是更愿意接受虞洽卿的所谓“议会”办法。不过,虞洽卿也表示建立“市民政府”,“要得党的同意”,最好是以委员会的名义。当汪寿华表示市政府仍会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虞才有些释然。^③在暴动问题上,虞表示自己无法游说张宗昌的部队,并称因早年陈其美曾打死过张宗昌的代表,张也绝不会对革命军和谈。^④但此话中是否有钮永建或蒋介石的意思,值得推敲。

当时,罗亦农等人也希望虞洽卿能代为筹措行动经费,但虞以安全原因拒绝,同时也怀疑汪寿华与罗亦农等人在背后泄露消息。^⑤双方之裂隙渐趋明朗。但中共正在大力扩充工人武装,建立暴动组织体系,因此很希望在经济上能得到虞洽卿等人的协助。3月2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会议上即明确表示,资产阶级仍然是上海的主要力量,虽然没有看到他们有政治力量,但经济力量很强大。^⑥4日,汪寿华再找虞洽卿,谋求解决经费的办法,但虞要汪先与钮永建商量。显然,他对“民党”内部已经出现分裂是有所了解的。^⑦

随着中共加紧策动第三次暴动,工人的情绪也高涨起来。他们成立工会,建立武装,并要求资方增加工资,令上海的商人普遍感到不安。一些工厂以承认工会为前提,希望工人采取缓和的态度,连傅筱庵也开始派人与总工会接洽。虞洽卿则介绍大丰纱厂厂主徐清荣以中国纱厂主代表身份找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希望总工会方面能体谅中国纱厂主的困难,在劳资问题上不要过分偏袒工人。^⑧此时,虞洽卿与汪寿华、罗亦农等人的关系,其实也成为他的一种资源。我们要解释其行动,都不能忽略这些潜在的权力,或居间代理利益的影响。当然,商人的行动也与当时的情势晦涩有关,各方都在权衡选择。即使如江苏特务委员会内部,在权力即到眼前时也开始分裂,蒋欲以吴稚晖为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大为不满。身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白崇禧对中共的态度此时也不明朗,其辖下第一师师长薛岳当时表现得“很左”,甚至支持工人打击钮永建等“右派”。^⑨所谓第三次暴动即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

到3月19日,北伐东路军进占松江,奉军毕庶澄部败退。21日,东路军第一师薛岳部占领上海龙华。此时,中共也发布总罢工命令,制定作战计划,各区工人武装开始攻击警察及正在与北伐军接洽归降的直鲁军队,暴动终于实现。租界当局则封锁边界,紧急布防,以免工人武装冲入。22日,北伐军完全占领上海。从目前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虽然无法知道虞洽卿在暴动中做了什么,不

①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24—127页。

②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40页。

③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61—262页。

④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20页。

⑤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20页。

⑥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94页。

⑦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73页。

⑧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305页。

⑨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380页。

过,在后来上海区委关于上海工人武装暴动的总结提纲中曾提到“奔走的虞、邬”^①。“奔走”二字,可能是指虞洽卿与邬志豪在此过程中与租界当局及其他方面交涉,或代为筹款。也就在22日,上海各主要商业团体联合组织商业联合会,以应付时局,保证商业安全。该会在24日推举虞洽卿、王一亭与吴蕴斋为主席。^②次日,虞即找总工会商量维持租界安全事宜^③,并致函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当局,表示已得军方及工方同意,愿意负责上海治安,保证不会有轨外行动。^④这无疑有助于提高虞洽卿在外人眼里的政治地位。

四、摇摆不定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

第三次工人暴动的目的旨在建立左派控制的上海市临时政府。由于新政府成立及权力分配是触动相关人物利益神经的问题,中共实力虽弱但显然想主导新政府,于是,钮永建、吴稚晖等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裂痕便表面化,夹在其中的虞洽卿等人的态度更显暧昧。

1927年3月5日,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吴稚晖即指中共搞市民会议是造反之举,钮永建也指责中共在革命军即将抵沪之际发动暴动是没有目标。然而,为了避免一党垄断,他们仍介入临时政府人员名单商议。在此份名单上,虞洽卿列名于15名委员,为其在政府中预备的职位是“外交局长”。^⑤12日,虞洽卿更以“临时座长”身份主持上海临时市民代表大会,会议还通过建设民选市政府,打倒军阀土豪劣绅等纲领。^⑥19日,虞又对汪寿华表示不愿意担任任何公开职务,“只做实际工作”,并声称已经向银行界筹款。不管这种表态是真是假,但在权力归属前景不明之时,与各种势力都保持一定接触,应该是当时上海不少“闻人”的心态。^⑦但同时,对反对国共合作之西山会议派,虞似乎警惕性又很高。档案显示,西山派的骨干人物张继曾经想游说虞洽卿另外组织一个排除共产党的政权,但被他拒绝了,且之后,虞还向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通报了此事。^⑧

1927年3月22日,在北伐军入沪的同时,中共主导的上海市民代表会第二次会议举行,选出临时市政府委员19人,名单包括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罗亦农、汪寿华、虞洽卿、陈光甫、王晓籁、郑毓秀、林钧、谢福生、侯绍裘、王景云、王汉良、李泊之、何洛、丁晓先、陆文韶、顾顺章。其中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员10人,占据多数。^⑨对这个临时市政府,蒋介石反应激烈。3月3日,临时市政府尚在酝酿之中,蒋就电令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进取上海,并要求其将“上海革命政府”等共产党控制的机关一律勒令取消。^⑩然而,此时的白崇禧似乎并不完全听命于蒋。23日,白崇禧抵达上海,并未遵蒋令立即取缔中共,只是宣布不愿担任市政府委员。而此前,钮永建已经宣布不担任委员,虞

① 《上海区委关于上海工人武装暴动的总结提纲》(1927年3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402—403页。

② 上海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③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60页。

④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64页。

⑤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78—284、293页。

⑥ 《上海市民代表大会通过市民代表大会之组织》,1927年3月15日《世界日报》,第3版。

⑦ 另一个“上海闻人”杜月笙此时也与控制几十万工人的汪寿华拉关系。不过他的目的在于保证其鸦片经营生意,希望新成立的上海市府不要影响他这方面的大买卖。如果这点能做到,杜甚至表示愿意整理全市青洪帮,听从汪之指挥。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09页。

⑧ 《共产国际代表曼达良、阿尔布利赫特、纳索诺夫、福京等人就第二次暴动的书面报告》(1927年3月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40页。

⑨ 周尚文、贺世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史》,第199页。

⑩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105页。

洽卿当时也处在犹豫状态。是故 25 日的中共特委会议决定 若虞洽卿不愿就职 即取消其资格。^①

3 月 26 日 蒋介石到达上海 驻在枫林桥上海交涉公署。虞洽卿是最早去见蒋的上海地方人士之一。据事后虞之报告 两人谈话的主题是外交与财政。外交方面 蒋介石大概希望虞能代为向上海外国使团领袖及租界当局解释南京事件 并声明收回租界问题决不诉诸武力。蒋对虞出面组织商业联合会表示支持 也希望延聘数位外交与财政委员来协助解决面临的困难。具体言之 蒋就是要虞洽卿与陈光甫、钱永铭、陈其采等人商议筹组江苏财政委员会 筹措 1000 万元军饷。次日 蒋介石又与虞洽卿继续商谈 估计主题仍不脱两事范围。^② 虞洽卿在这些方面皆富有经验 在上海商界又拥有较高地位 显然成为蒋的重要依托者。^③ 同时 蒋对临时政府之反对态度 估计也在影响虞的抉择。是故 虞在中共眼里也表现得愈来愈消极。3 月 28 日 上海区委会议遂决定准备取消虞之委员资格 补选薛岳、孙科为委员 且在分配职位时 也未列入虞洽卿。^④ 然而 我们仍可从上海临时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通告中看到虞的名字。在 13 名就职委员中 除虞和王晓籁、陆文韶之外 其他均有中共身份。^⑤ 可见 中共对虞之政策仍徘徊不定。

上海临时市政府在蒋抵沪后 更难开展活动。市政府委员就职后 秘书长林钧及委员王汉良 即曾收到恐吓信 限 24 小时解散市政府 否则以最后手段对付。^⑥ 蒋更致函临时市政府要求其“暂缓办公”^⑦。在此种情形下 市政府似乎越来越维持不下去。^⑧ 其他方面的不合作态度 也使得市政府有完全赤色化的趋向。到 4 月 1 日 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会议上 罗亦农提到 “市政府方面现只十一人 八个 C. P. 三个商人 未来是个工商政府”^⑨。这三个商人 应该包括虞洽卿在内。^⑩ 当然 虞之所以保留这个职位 可能也有与工会周旋的考虑。汪寿华曾请虞洽卿帮忙解决款项问题 虞似有所承诺。^⑪ 不过 当时中共年轻的干部或苏俄代表却似乎乐见上海临时市政府的“工人阶级化” 转而放弃了原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打算。中共上海区委在一份报告中就表示 尽管大资产阶级仍可以组织在革命的联合战线之内 但其力量甚为弱小 “不能完全脱去帝国主义经济附属的影响 要望他们有力量的立在政治的主体建立一个相当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十分困难”的。并且称“虞洽卿、王晓籁算是大商人最热心革命 但他们是稍遇打击即不敢出头 比较还算王勇敢一点 然一切行动亦恃我们指导与帮助 处处要跟着我们走”。^⑫ 此时 已拥有数十万工人支持以及数千武装力量的中共领袖 似乎已不再需要依靠“大资产阶级”来发展势力。

到 4 月初 中共与所谓“新右派”在上海已是剑拔弩张 政权之争成为焦点。在此过程中 虞

①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 388 页。

② 宓熙《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 23 辑 第 24 页;李雪云、金绳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摘译,1927 年 3 月 1 日—4 月 30 日》,《档案与历史》1987 年第 1 期,第 45 页。

③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 第 146 页。

④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 426—427 页。

⑤ 《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通告》,1927 年 3 月 29 日《民国日报》第 1 版。

⑥ 《国货“法西斯脱”》,《中国青年》第 160 期,1927 年 3 月 26 日,人民出版社 1966 年影印版 第 239 页。

⑦ 《蒋总司令致临时市政府函》,1927 年 3 月 30 日《民国日报》第 3 版。

⑧ 在一份文件中 中共也承认市政府许多人辞职 因此干不起来 《上海区委关于上海工人武装暴动的总结提纲》(1927 年 3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 第 402—403 页。

⑨ 《中共上海区委有关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文献七篇》,《档案与历史》1987 年第 1 期 第 13 页。

⑩ 1927 年 4 月 2 日 上海临时市政府在免去钮永建与陈光甫二人的委员资格时 仍没有免掉虞洽卿。刘国铭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357 页。

⑪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 219 页。

⑫ 《上海区委关于上海市民会议运动的指示》(1927 年 4 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 第 430—431 页。

洽卿的态度也趋于明朗。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李宗仁、黄绍竑、陈果夫在上海开全体紧急会议,由吴稚晖正式提出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案,决议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中共首要分子以非常紧急处置。清党运动开始在南京、上海等地开始。6日,上海临时市政府公布机构长官名单,但并没有宣布虞洽卿的职位。^①这应与虞的态度犹疑有关。8日,在蒋之支持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以吴稚晖为主席,蒋授权该会掌握上海军政财权,与中共主导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处于对立地位。^②虞洽卿等人负责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在此前一天即向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申请立案登记^③,暗示这些商人已提前承认该委员会为“正牌”权力机构。有趣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此时得到的报告却称“闸北商会会长王晓籁和虞洽卿加入了共产党,他们二人财政上都很困难。”^④当时,虞、王两人经济困难属实,然而,称他们加入共产党应该是谣传。也许与上述变化有关,9日,虞洽卿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启事,称“洽卿专营航业,未遑他顾,地方社会各事概不预闻,早经登报声明,今又承各界推举各职,亦未预闻,乃远近亲友纷纷来函介绍,未免误会,深恐函答不周,用再奉告,诸希谅解。”^⑤

在虞洽卿登出启事的当天,汪寿华曾把一份《告全上海市民》宣言送给虞,希望他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与总工会及“上海商民协会”联署发表。该宣言主要试图澄清外界对中共的担忧。^⑥但虞未表同意。三天后,“四·一二”事变发生,上海临时市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中共控制的机关被全部封闭,禁止活动,而一直与虞保持密切来往的总工会领袖汪寿华也被诱杀。据目前披露的材料看,此后虞洽卿与中共再没有直接的联络。

过去许多研究都认为以虞洽卿为代表的“江浙财阀”与蒋介石之合作,源于国民革命对资产阶级之震慑,因此,需要借助蒋介石的力量来压制民众运动。例如,有人不但把王晓籁、盛冠中等人1926年7月广东之行判定为双方建立关系之初步,甚至有人称虞洽卿在是年11月便到南昌见过蒋介石,提出“以反共灭共为条件,答应给蒋以财政上的援助”^⑦。其实,上海劳资问题激化是1927年3月之后的事情,此前虞洽卿等人与南方国民党势力的联系,恰恰是中共在上海活动得以开展的一个背景。如前所述,正因为虞等人的合作,不但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得以展开,也促成三次暴动与临时市政府的成立。同时,对虞洽卿、王晓籁等人来说,由于其与总工会及左派势力有密切关系,因此他们也藉此获得与租界当局谈判的重要砝码,并成为商界试图与总工会谈判需要依靠的人物。

^① 据吴开先回忆,当时临时市政府似以虞洽卿为“傀儡”市长,而中共学联主席林钧以秘书长职务代为控制全局(张继高访问、记录,郭廷以校阅《吴开先先生访问纪录》,台北《口述历史》1996年第8期,第120页)。依据目前材料来看,此一记忆应该有误。中共原来准备以钮永建为市政府主席,当钮退出政府后,主席人选便难产了(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372页)。

^②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初稿),台北,“国史馆”1988年版,第622—623页《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成立》,1927年4月13日《世界日报》,第3版。

^③ 上海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④ 李雪云、金绳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摘译,1927年3月1日—4月30日》,《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1期,第50页。

^⑤ 1927年4月9日《新闻报》,第1张第1版。

^⑥ 《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229—230页。

^⑦ 此说较早出自穆恒《“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商业联合会》(《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后来读研《“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与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一文对此有更细致的描写。相关引用亦可见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第370页;Joseph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p. 116。不过依据目前材料(如蒋介石私人档案及日记)来看,笔者尚未发现任何支持此说的证据。北伐开始后,虞洽卿第一次见蒋介石应该是1927年3月26日。从本文的叙述,也大致可以看出虞在此前主要依靠钮永建等人与蒋介石保持联络。

双方的互相利用 对北伐前后上海政局的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结 论

北伐前后是虞洽卿一生的黄金时代,其个人声望在这段时期内达到顶峰。1924年,虞开始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并成为江浙战争中调解各方的首脑;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虞更成为当时的显赫人物之一。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中外各方(包括共产党在内)均需倚赖与其合作,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虽然中共对虞洽卿在后来运动收束阶段所起的作用有敌意,但是五卅运动之后,中共显然认识到虞在上海所具有的巨大个人影响力。由此,虞仍成为中共主要争取的对象,虞也曾与中共干部多有接洽,以至于1926年秋,被莫斯科视为建立上海政权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所谓“资产阶级左派”的代表人物。

“四·一二”事变之后,中共对失败原因有过很多检讨,目前看到比较早的一份记录是1927年4月18日上海区特委会的记录,传达中央对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其中提到失败原因,归纳的第一条就是“没有坚决认定对于大资产阶级的策略”,认为暴动的目的在于与大资产阶级争领导权,所以“对于资产阶级的认识”应该是中共的中心问题。^①上海区委内部的自我批评也承认“不明阶级的反动而力图与大资建立联合战线,致将小资力量估轻”。认为自己是“没有坚决明确的阶级觉悟而失败”。^②显然,这种总结已在否认此前对虞洽卿等人的联络政策。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开幕。瞿秋白为了反对陈独秀等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将其撰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在会上散发,集中批评彭述之的观点,而联合虞洽卿的失败也成为批判陈、彭两人的主要证据之一。瞿也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然而,从商人角度来看,政治时势动荡之际,如何保护既有产权与藉机拓展商业利益则是其抉择的主要动机。在北伐开始后,当政治军事形势渐渐变得对南方新兴国民党势力有利时,一些人便已在暗中与其建立联系,这种联络既包括直接利用国民党发展其市场体系的南洋兄弟烟草企业主简照南^③,也包括为了保护北伐军所到地盘商业利益的一些银行家,如张嘉璈^④。当然更包括富有政治投机色彩的商人如虞洽卿,以及所谓“马路政客”王晓籁。尽管虞洽卿等人在1927年3月前表现出非常“左倾”的色彩,在许多方面也与国民党及共产党有实际层面的合作,然而,这些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与在国民党的框架中进行,也可能是与蒋介石分不开的。对虞来说,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既是宁波同乡,更是以前的老熟人。这层关系在南方势力蒸蒸日上之际,便成为重要的人事资本。面对新兴军事势力对上海的控制,工商界也被迫应付,虞洽卿也当然成为工商界与蒋介石及其新政府交涉的重要媒介。对于蒋介石来说,为了能尽快筹措到急需的军饷,他更需要熟识的商界元老来为其疏通各方,实现其募款计划。在1927年5月初,蒋甚至欲以虞洽卿担任财政部次长。^⑤虞虽不愿担任此

① 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463—464页。

② 《关于对机会主义的自我批评意见提纲》(1927年4月29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421页。

③ (美)高家龙著,樊书华、程麟荪译《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90—295页。

④ 王正华《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⑤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第407页。也许因为这层关系,当一年以后中央银行成立时,虞洽卿被任命为监事。《中央银行条例国府已公布》,1928年10月8日《世界日报》,第3版。

职,但私下继续为蒋介石之财政问题出谋划策。正因为此,虞洽卿在“四·一二”之后,便被中共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典型。不过,无论是1926年的“左”,还是1927年的“右”,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虞洽卿始终想在这种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中,找到于己有利的合作者。

如果说商人为了挽救地方秩序被动性地介入政治是“在商言商”,那么,北伐前后某些商人主动的政治参与,或可被称作“在商言政”。相对而言,近代中国大多数的商人,均没有那种以“理想政权”为目的的政治抱负,商人更倾向于与特定政治势力结合,以追求更多的个人财富与名望。在这种参与过程中,商人们喜欢通过个人关系网络的营建,以及政治立场的表态,来强化与某个可能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力量的关系,藉此培植政商资本,为自己的商业经营铺平道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甚至也会与某些激进政治力量相结合,通过打击其他政治势力甚至商人来增厚个人势力。北伐前后虞洽卿等人与中共及国民党的合作,其背后脉络是如此,1937年后一些商人与日本军方的合作也是如此。甚至今天不少中国的商人仍在依此种逻辑扩展其商业帝国。这一特点也许是我们思考中国近代以来的政商关系所不能忽略的。

如果不将从五卅到“四·一二”的历史联系起来观察,我们便无法对虞洽卿的角色有准确的认识。当然虞未必能代表上海商界多数商人的倾向,然而,作为一个喜欢涉足政治的商人,他在北伐前后的表现确实能反映中国商人潜在的“政权投机性”,中共之所以将虞视为最重要的合作者,也是因为其背后的潜在势力。这种密切关系,也为后来中共对虞洽卿全力支持蒋介石表现出的愤怒埋下伏笔,我们如不了解“四·一二”前的史事,是无法完全明白中共后来所讲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究竟从何而来。这种说法不仅是针对蒋,也是针对曾经与中共密切合作过的虞洽卿、王晓籁等上海商人。中共甚至苏共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观感,以及党内关于“革命发展道路”的争论,其实均与北伐前后中共与虞洽卿等人的合作经验密不可分。从中共角度来看,其早期与上海商人的关系也显示出实用主义的特点,中共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抱牢教条主义不放的政治团体,当现实政治对他们的发展有利时,中共对所谓“资产阶级”的性质的分析也倾向于宽容或“右倾”,其报告中会弹性地对“阶级形势”作乐观的分析。当商人放弃与他们的合作,他们则开始用严厉的语言攻击“大资产阶级”,现实的“阶级分析”与此前又完全不同。因此,意识形态叙述其实是紧跟在政治利益之后,又与党内权力斗争相连,这也是不同的中共党人在不同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往往大不相同的原因。

其实,从北伐前后中共与虞洽卿一派商人合作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内部很清楚虞、王等人的投机性质,然而,他们在写报告时,又会有意将其动机“阶级化”。这种实际与理论的矛盾与落差,始终困扰着中共党人。由于中共革命是建筑于阶级理论上的,现实的斗争又与此不能完全吻合,所以意识形态叙述常常出现前后矛盾、互相冲突的现象,而理论、方针也随之变动。易变的主义与政策,加上权力斗争,便使得理论阐述缺乏连贯性,而具体实践与理论阐述之间也存在重要差别。因此,研究者也许需要从其实践入手,重新认识其行动逻辑,而不是依据其表述的“合理性逻辑”,唯有此,我们才能对中共革命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中共内部“实干派”的看法与“理论派”的看法有重大的差别。前者看法虽然接近事实,但是在政治上却未必正确,所以他们在表述时,常常会以现实附会理论,从而为自己的行动找到合法性。而理论派,或其政治对手,则会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以理论来说明实干派的做法为何失败,从而为自己夺取党内权力制造合法性。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经一再重现。

(作者冯筱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杨宏)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5 ,2010

Provincial Officials’ “Local Problem” in the Qing Dynasty Local Civil Service Reforms

..... *Guan Xiaohong* (4)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 academics have used the concepts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discuss reform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civil service systems and the conflicts aroused by the reforms during the late Qing New Policies. These discussions have overlooked a number of issues: the repeated assertions by provincial governors and governors-general since the Yuan Dynasty that provinces were not “local” at all; the unwillingness of governors and governors-general to become “local officials” under a new constitution; and the fact that no order issued by the Qing court had ever designate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s belonging to the local level of government. People at the time just took the concepts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foreign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mechanically applied them to the Qing Dynasty’s ministries and provinces. Not only did this approach bear only a superficial resemblance to the intent behind the Qing’s construction of their system out of the consolidation of earlier dynasties’ accomplishments , it also caused great confusion in the Qing reforms and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rovincial system. Indeed , for a long time it has placed limits on later generations’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s. This tens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between New and Old in the conceptual system reflects the deep and complex connection between systemic reform and historical culture , and will pose a difficult challenge for China’s reforms in the future.

Between the “Left” and “Right”: Cooperation and Division between Yu Qiaqi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ound the Time of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Feng Xiaocai* (31)

Over the period spanning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close contacts with Yu Qiaqing and some other businessmen in Shanghai , and it i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the three armed uprisings of Shanghai workers broke out. Throughout this process , Yu Qiaqing was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 bourgeois leftists ," and an important partner in building the " Provisional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Shanghai after the workers’ uprisings. However ,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Yu Qiaqing and the CCP was still carried out within the Guomindang framework. When his old friend Chiang Kai-shek arrived in Shanghai , Yu Qiaqing became an important financial advisor to Chiang. Though Yu Qiaqing’s behavior perhaps did not represent the inclinations of most businessmen , it reflected the potential for political opportunism in some businessmen’s minds and the deliberate manner with which they manage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Affected by the situation and environment of the time , the CCP also made flexible use of " class analysis" to explain its policy of using Yu Qiaqing and his ilk. However , the failure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 bourgeois" provided the opposition within the CCP with a basis for criticism , and even affected the party’s later tendency towards ideologically driven policy.

Yan Xishan’s Interception of the Red Army’s Eastern Expedition and His Multilateral Political Maneuvers *Deng Ye* (49)

The Eastern Expedition was the Red Army’s first head-o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Jin-Sui Army. Neither side did enough to evaluate the situation at first , as far as expectations for the war were concerned. From the beginning Yan Xishan suspected that the Red Army’s arrival was instigated by Zhang Xueliang , so he refused reinforcement from Zhang’s army , and brought the Central Army into the fray instead. The two armies’ successive entrances into Shanxi province both violated the Japanese policy of self-government for North China , so the Japanese put repeated pressure on Yan Xishan , asking that Shanxi maintain a “ Monroe attitude. ” In order to avoid serious devastation of Shanxi by the war , Yan Xishan did not do his best to encircle and annihilate the Red Army in Shanxi according to Chiang Kai-shek’s plan. Instead , he adopted a strategy of pursuit and attack , in hopes of expelling the Red Army from Shanxi as quickly as possible. Yan argued with his subordinates about encirclement versus pursuit. The arrival of Central Army forces in large numbers and their extensive construction of blockhouses changed battlefield conditions and forced the Red Army to return to northern Shaanxi. Yan Xishan strongly urged encircling and annihilating the Red Army in northern Shaanxi , but Zhang Xueliang was not very supportive of